

形态的意义与表达方式

——评江荻的《藏语词法和形态》*

罗天华 邓舒文

[提要] 在宏观的形态学视野下,《藏语词法和形态》以词法表现形式为切入点,探讨词法和词库、词类和词法的种种关联,揭示了藏语派生、屈折、重叠、复合等词法面貌。该书认为复合是藏语的重要构词方式,内部形类语素间蕴含施事、受事、工具等语义关系,并将词长视为形态表现;所提“音节数形态”“词形分类、词类分形”等论断均体现出藏语形态表达方式的多样性,丰富了形态学的一般理论。本文尝试概述该书的主要观点,并评析一些论述的优长及其对跨语言形态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 藏语 形态 词法 形态意义 表达方式

形态学研究词的结构。词由语音形式表征,词的组合构成各式短语和句子,各种结构表达不同的语义,因而形态是音系、句法和语义三者之间的联系纽带。形态学历来是语言学的显学,其成果应用于历史比较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作为确定亲属语言和划分语言类型的重要依据(Humboldt 1836:106-132; Schleicher 1859:1-35; 梅耶 1957:21-23; 徐通锵 1991:35),直接推动了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科得以确立。

汉语常常被视作孤立语的代表,国内学界或多或少因为汉语“缺乏形态”而缺乏形态学研究,相关讨论一直显得较为沉寂。江荻的《藏语词法和形态》一书于202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内第一部讨论藏语词法和形态的专著,拓展了对藏语形态问题的认识,并对(重新)探讨汉藏语系其他语言的形态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

谈形态,传统上主要是谈屈折和派生。藏语词汇的复合特征也比较突出,因而该书就屈折、派生和复合三个主要问题进行章节铺排,全书共10章。第1章讨论形态、词法、词库等核心概念以及词库与词法的基本特征;第2章梳理和评述国内外藏语词法和形态的研究概况;第3-8章描写藏语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的词法和形态;第9章探讨古藏语的形态,第10章总结全书。以下分4个方面评述该书的主要内容。

一 词法和形态

该书取名《藏语词法和形态》,似乎表明“词法”和“形态”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实

* 本文受浙江省社科规划之江青年课题(22ZJQN06YB)、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谢。

际上,在西方研究传统中,“构词法(word formation)”与“形态学(morphology)”的内涵基本一致,指使用加缀、重叠或内部交替等方式构成新词形。词形变化既包括词义改变后进入词库的“派生造词”(即“构词”),也包括词义不发生改变、不进入词库的“屈折变化”(即“构形”);后者已经涉及句法层面,表达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义,由于其负载形式为词,仍作为构词法研究的一部分(Matthews 1991:9-19)。

如果说屈折和派生仍然是词内变化,那么复合就是词间变化。有些印欧语的屈折和派生形式很丰富,而汉语则是复合词特别多,藏语的构词法大致处于印欧语和汉语的中间状态:一方面有丰富的屈折和派生形态;另一方面复合化是现代藏语的主要发展趋势。因此,作者采用“词法”概念涵盖以上所有发生在词汇层面的词形变化,既延续了西方传统形态学的内涵(派生和屈折),又结合了藏语以及其他汉藏语言的个性特征(复合)。

不过,“形态”的内涵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明晰。“形态”究竟指涉狭义的屈折形态,还是较广义的派生形态?甚至是包括复合在内的构词法?至少在汉语学界,关于汉语有无形态的争议一直没有完全定论。一种相对普遍的观点是现代汉语没有形态,这种观点实际上将形态的内涵限定为狭义的屈折形态。如果考虑到派生不适合描写现代汉语以复合为主的事实,也将复合纳入形态的范围,那么也可以说汉语有形态甚至形态丰富。此外,“上古汉语有形态”之说则强调上古汉语以派生形态为主要构词法,通过丰富的词缀和音变手段,在词根的基础上构成新词(Sagart 1999/2004; Schuessler 2018:210; 金理新 2021)。

因此,“形态”的内涵之争主要有两种极端做法:一是将其限定在狭义的屈折构形层面;二是将其扩大至包含复合在内的构词层面。这两种做法可能都不利于对语言整体类型的基本判断,要么使“屈折”这一特定构形功能被过度强调,由此忽视其他语法手段的同等作用;要么使“复合”这一相对普遍的现象被过度放大,词法和句法的界限不复存在^①。

从构词方式看,“形态”应主要对应加缀或交替这类词形变化(超音段层面也包括变调、重音等手段),只不过往往涉及构词和构形两个层面。而“构词法”包含形态构词法(即派生构词)和复合构词法两类,如图1所示(刘丹青 2017: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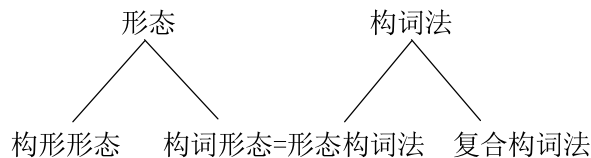


图1 形态与构词法

需要说明的是,“形态”在构词和构形上的界限有时并不明晰;例如英语的词形变化,元音交替或异根有时无法确定其功能在于构形还是构词,如名词goose“鹅”的复数形式为geese(元音交替),动词go“去”的过去时为went(异根),与大部分复数义添加后缀-s、过去时添加后缀-ed的规则类推现象不同,问题是geese、went是否已构成新词?有关解释仍然远未形成共识(Matthews 1991:129、139; Haspelmath & Sims 2010:25、111、292-294)。接受面相对较广的观点是,构词形态创造新词,构形形态构成同一个词的不同语法形式。但这种区分

^① 作者与我们通讯谈到,“词法和句法的界限,相当于词法和短语的界限。一般情况下,词和短语是能够区分的,就像词典(词库)收词但不收短语,至少要合乎语感。按Packard的复合词分析方法(形类分析法),问题更简单,即不(能)用句法分析方法来分析词法。在这个意义上,复合并没有放大狭义形态”。

是概念性的而非操作性的，不同语言需借助其他标准确定何为新词、何为同一个词的不同形态，且实践中允许存在构词和构形的模糊地带（Laca 2001；刘丹青 2017:284-286）。

藏语的情况与此类似，该书谈到藏语的词缀有时也无法判定为构词还是构形，如名词 *rtsom-pa* 由动词 *rtsom* “写作”和名词化词缀 *-pa* 构成，存在两解：一是抽象名词“著述”，属构形，词义未发生改变，即自指；二是具体名词“文章”，属构词，表与动作有关的事物，词义发生改变，即转指（江获 2021a:2）。作者认为，要明确以上问题，需要界定各语言语素、心理词库和完形词等概念。

二 语素、词库和词法

语素、词库和词法是形态学研究的3个基础概念。语素是进入词库或进入构词过程并承担词汇或句法功能的语音片段。东亚语言的单音节性决定了藏语的词根和词缀都是单音节语素，分属词汇语素和语法语素。词汇语素又分成词语素、不成词语素和条件成词语素3类；而语法语素分词缀语素（即构词词缀，属词法领域）和句法语素（即虚词，属句法领域），后者虽不是词法处理对象，却是词库的研究对象。派生词即各类词汇语素（词根）加词缀语素，而复合词则是各类词汇语素的组合。词库是稳定且基本的心理词汇，含各词项和词项材料，且不可预测。词法是动态或临时的外围词库，用规则将词项作为材料生成更复杂的词项。不同语言的词法和词库各不相同。如英语是词缀构词，词库中含大量词缀，复合构词较少；汉语是复合构词，词库中含大量词根，词缀构词较少；藏语二者兼备，以复合为主，但派生也占相当比例（如形容词基本就是派生词），重叠和屈折占少部分。

作者借用“完形词”概念描写藏语的词法^①，认为藏语不同词类的完形词的结构不同，如单音节动词可直接构成完形词，但单音节名词仅部分（即成词语素）构成完形名词，其余需添加词缀（即不成词语素）。由此，作为完形词的动词和名词词根添加词缀的需求不同，前者为自指（不改变词义）或转指（改变词义），后者仅为转指。此外，藏语的词根和词缀之间存在中间状态，因此复合和派生的界限较模糊。综合以上现象，作者认为藏语词缀语素的功能十分复杂，需各自归纳分类，以确定其词法意义。厘清以上概念，就基本确定了藏语词法和形态研究的理论基础。抓住藏语的词法特征，作者从两种视角划分藏语词库的词汇单位（江获 2021a:29）。一是按语音形式分：音节型单位（书面形式分：单音节词/语素、双音节/三音节/多音节词，黏着性书写单位）和非音节型单位（前置附着辅音型语素、后置附着韵尾语素、黏着性辅音语素、黏着性元音语素）；二是按词法类别角度分：词汇语素、自由词根语素、黏着词根语素、半/准黏着词根语素、前缀语素、后缀语素、语法语素、句法词、标记语素。这种分类与后文提出的“词形定类、词类分形”等观点是照应一致的。

三 词形定类、词类分形和词长形态

在分章描写藏语各词类构词情况的基础上，作者指出一类特殊现象，即藏语的词形和词

^① “完形词 (gestalt word)”指语法功能上能独立运用的最小句法单位，心理上能够进入人们记忆体系的完整单位（Packard 2000:80-133）。

类之间存在直接的对应关系：名词多为双音节（复合、派生），动词多为单音节（屈折），形容词多为双音节（派生）、三音节或四音节（状貌形容词、复合一派生），代词和指示词大多为单音节或词缀派生词、其他语法词多为单音节词。据此，作者提出“词形定类、词类分形”的观点，认为藏语的大部分基本词汇可依据词形判断其语法功能类别，反之亦然（江荻 2021a:156-158）。词形涉及词长（单音节词、双音节词、三音节词和多音节词）和词型（单纯词、派生词、重叠词和复合词）两个要素，二者也存在直接对应：单纯词多为单音节，派生词多为词根+词缀，复合词为词根+词根。作者认为词长是隐性的形态，是派生、屈折、复合、重叠等显性词法类型赖以产生的前提基础，可以据此区分藏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

汉语也有类似的情形。吕叔湘（1963）指出，汉语的三音节短语大都属于偏正或动宾，偏正组合中，2+1式比1+2式要多得多（比较“示意图~副作用”）；与之相反，动宾组合中，1+2式多于2+1式（比较“买东西~吓唬人”）。沈家煊（2016:365-369）提出，偏正/动宾短语的性质主要不是看内部成分的名词性或动词性，而是看单双音节的区分，“‘单双区分’比‘名动区分’更重要”，音节组配“本身就是一种（综合性）形态”。周韧（2022:5-11）进一步认为，音节数目是现代汉语表达语法意义的重要手段，其功能与语序、虚词类似，“对于汉语语法单位的性质有重要的预测作用”。短语的属性显然是“语法单位的性质”之一，看来音节数目不仅决定藏语的词类属性划分，也决定汉语的短语类别属性。

将音节的数量作为基础形态（称为音节数形态）来研究不同语言的词法及相关现象，这是该书的一项创新。作者认为，多音节是早期人类语言的音节形态样貌，《方言》中的联绵词和《尔雅》中的双音节名物词都是该演化过程的遗存（江荻 2013a, 2013b, 江荻 2014a）。语言音节形态的多样性是词形结构的演化结果，取决于音节构造形态类型和词的音节长度，共时上可根据词形结构划分语言类型为3类：①辅音丛和多音节并重形态，如欧洲、西亚、中亚、东北亚地区；②简单辅音和多音节形态，如美洲、非洲、太平洋区域语言；③单音节词以及单音节词内单一辅音与辅音丛交替的形态，如东亚和东南亚语言（江荻等 2014）。作者认为音节数形态是一种隐形态，是词形定类前的韵律和语用基础，容易被忽视；作者近期有多篇论文讨论该现象。此外，与之密切相关的“表现形态（expressive morphology）”也突破了以往对词汇构成和词汇渊源的既定认识，挑战并补充了现有的词汇及词法研究理论和方法。如藏语 ABA'B 式状貌词的本质为凭借语音像似性思维造词，而非受语法规则约束的构词，因此句法自由度极高，并逐渐形成异于语法形态构词的词汇类（江荻 2021b）^①。这些观点对于学界深入认识形态的共性与多样性都不无启发，其中依据音节数量或曰音节数形态来区分藏语的词类（江荻 2020），是否适用于解释东亚语言单音节性区域特征，很值得探索。

四 简 评

该书有许多优点，其涉及内容较广，引证语料扎实，整体呈现了藏语词法和形态的基本面貌^②。从跨语言比较和形态学理论研究的角度看，其长处还在于从形态的意义看形态的表

^① 蒙作者告知，该书在正式出版之前有较大篇幅的修改，ABA'B 式状貌词和表现形态等相关讨论有不少删节；参看江荻（2021b）。

^② 该书在语料处理方面相当周全。全书语料使用藏文、藏文拉丁转写、中文（有时还用英文）对照的撰写方式，藏文和拉丁转写完全对应，藏语、汉语、外语背景的读者都没有任何阅读障碍。

达方式，发掘出藏语形态手段的共性与个性。

在形态方面，该书对藏语的词法和形态作了细致的刻画。如概述了藏语的14个词类、语序、范畴和结构等超出词法的句法问题，还介绍了古藏语的词法、形态及传统文法、早期藏语文等方面的研究（江荻 2021a:32-45、52-93、422-436）。又如按照语义类别对名词词缀、形容词词缀、副词词缀等各类派生词缀分类描写，其中名词词缀又区分词缀、类词缀和前缀语素等（江荻 2021a:95-153）。再如，将复合名词分9类（N+N、N+V、V+V、V+N、ADJ+ADJ、N+AJD、ADJ+N、ADJ+V、V+ADJ），指出其内部不区分核心和非核心成分，多为双音节；将复合动词分3类（N+V、V+V、A+V），指出主要是双音节和三音节，四音节较少（江荻 2021a:156-206、207-256）。

最后，关于重叠，以藏语动词重叠的构词和构形功能为重点，也涉及形容词重叠的构词功能、部分副词重叠的构词或构形功能和少量名词重叠的构词功能（江荻 2021a:207-256、320-421）^①。这些细致的形态描写工作，都有助于读者了解藏语语法的基本面貌。

在理论建设方面，该书将词长或曰音节数量视为形态表现手段，并认为在藏语形态（句法）学中起到重要作用，拓展了形态学研究的范围。世界语言的形态表现手段不尽相同，但各式形态所负载的意义（姑且称之为“形态义”）完全可能相似甚至相同，这是形态表现手段的共性与多样性（Nichols 2016）。类型学对形态的定义主要有两种，其一是“语素的组合如何构成新词”；其二是“词形和词义的系统共变”（Haspelmath & Sims 2010:2-3）。该书将复合视为藏语的重要构词方式，将词长或音节数量纳入形态表现或曰形态库藏，并以此区分藏语的词类，主要涉及如何构词问题。同时探讨这些形态形式与相应语法范畴的互动（江荻 2021a:207-256），是在词形和词义共变方面的理论探索。

书中的讨论也常常引发我们对一些形态问题的思考，这里再列举数端。

1. 有关名词派生词缀的混用现象。该书的推测为：语言发展的复杂性因素可能导致词形与意义对应关系的模糊化，有些词缀可能减弱或丧失原有的意义，即去语义化。有些词缀可能兼类表示多种意义，削弱了自身形式与原初意义的对应关系，还有些词汇语素可能因自身因素“鹊巢鸠占”，逐渐虚化进入词缀位置，与表达同样意义的词缀竞争（江荻 2021a:150）。这是词形与词义系统共变的精彩个案。

2. 有关复合构词法。该书认为复合构词法从句法继承而来，通过词汇化及其所催生的构词法而不断产生。复合词作为一种词法类别是与单纯词、派生词、屈折词等相对而言，甚至可看作一种形态过程（江荻 2021a:163）；这是该书贯彻始终的复合词分析方法，也呼应了Packard（2000）的复合词描写。对复合词结构内部的分析应以语义分析为主（施事、受事、工具等），而不适用句法结构关系分析（主谓、偏正等）。这种提法与一般教科书对复合词的（句法结构）分析全然不同，其理论操作也非常简洁：一旦不把句法分析方式用于词法分析，也就破除了以往词法研究方法中的观念纠结，利落地区分了词法和句法。

3. 有关单音节动词的屈折形态（江荻 2021a:207-256）。该书涉及时体（示证）、使动范畴、祈使式、敬语式以及动词重叠的词法和句法功能。这些都是动词形态研究的热点，也是难点。该书提出，近现代藏语动词时、式范畴标记逐步消亡的可能原因之一是：藏语屈折形

^① 作者通讯谈到，“（语素）重叠究竟算什么？重叠与复合的结构都是‘语素+语素’，如果按一般观点将重叠视为形态，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对重叠的认识来界定复合词，将复合词视为两个不同语素的叠加”？按这种视角，重叠可以看作特殊的复合，即“（相同）语素+（相同）语素”。

态所涉及的基本都是单音节词根词或词根语素,这种结构形式不符合藏语语言的发展和表达方式的丰富化(江荻 2021a:261)。好奇的读者也许会追问,藏语时、式的发展为什么与语言整体发展步调不一?这种单音节时、式标记的消亡现象是否普遍?或者说,为什么现代藏语是体貌形态范畴语言而非时态范畴语言?古代藏语区分三时(过去/现在/将来时),但为什么不足以解读时态现象,包括表达“时”范畴的是前缀还是后缀这类问题。在瞿霭堂(1980)、张济川(2009)研究的基础上,该书提出古藏语先时后体或者有时一体共存阶段的可能(江荻 2021a:217-222)。

4. 关于双音节动词。对现代藏语词库中存在少量的双音节动词,该书认为只是早期发展的遗存,或者是临时产生不具有能产性的偶发现象。双音节动词虽然产生较早,但可能受到词长分工(隐形态)的制约,数量上一直没有较大增长(江荻 2021a:270-283)。“词形分类”是词长分工的结果,但是,一经成为有效的形态手段,音节数形态对词类划分及发展有直接的制约作用。

5. 有关古藏语中名一动共享词根。该书提出:早期语言可能没有名词和动词的区分,随着表达的需求和词汇化、语法化构式的发展,人们在同一概念词前后添加性数、格、时、体、态等区别要素而使其逐渐分开(江荻 2021a:436)。这种“概念词”及词形发展的思路,对于解决汉语的名词和动词问题提供了一项参照。

总体而言,该书以藏语的词法表现形式为切入点,涉及动词屈折形态以及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词类的构词类型(派生、重叠、复合),对基础词类的构词方式作出了符合实际的观察和分类,探讨了词法和词库、词类和词法的种种关联,涵盖藏语形态的各个主要方面,系统阐释了形态意义和表现形式之间的错综关系。此外,该书以印欧语言的形态研究为大背景,在较宏观的视野下发掘藏语词形结构特征,凸显词法的音节数形态和构词类型,提出“词形分类、词类分形”等观点,既拓展了藏语的词法和形态研究,也丰富了形态学的一般理论。在此意义上,该书不仅是一部藏语形态学著作,也是一部普通形态学理论著作。

参考文献

- [1] 江 荻. 2013a.《音节型语言演化的语音后果》,载石锋、彭刚主编《大江东去——王士元教授80岁贺寿文集》第371-388页,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 [2] 江 荻. 2013b.《王念孙的联绵词“天籁”说证》,《语言科学》第5期.
- [3] 江 荻. 2014.《〈尔雅〉词汇形式证明汉语曾是多音节词语言》,《古汉语研究》第3期.
- [4] 江 荻. 2020.《藏语形容词的音节数形态与形态类型》,《中国语言学报》(第19期)第1-2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5] 江 荻. 2021a.《藏语词法和形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6] 江 荻. 2021b.《藏语ABA'B式状貌词与表现形态理论》,《中国语文》第6期.
- [7] 江 荻、康才峻、燕海雄. 2014.《词形结构进化与世界语言的多样性》,《科学通报》第21期.
- [8] 金理新. 2021.《上古汉语形态导论》,合肥:黄山书社.
- [9] 刘丹青. 2017.《语法调查研究手册》(第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10] 吕叔湘. 1963.《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第1期.
- [11] 梅 耶. 1957.《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译,北京:科学出版社.
- [12] 瞿霭堂. 1980.《阿里藏语动词体的构成》,《民族语文》第4期.

- [13] 沈家煊. 2016. 《名词和动词》，北京：商务印书馆。
- [14] 徐通锵. 1991. 《历史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 [15] 张济川. 2009. 《藏语词族研究——古代藏族如何丰富发展他们的词汇》，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
- [16] 周 韧. 2022. 《汉语韵律语法研究的音节—语义视野》，北京：商务印书馆。
- [17] Haspelmath, M. & A. D. Sims. 2010. *Understanding Morphology* (Second Edition). London: Hodder Education.
- [18] Laca, B. 2001. Derivation. In M. Haspelmath et al.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Language Universal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pp. 1214-1227.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19] Matthews, P. H. 1991. *Morpholog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 Nichols, J. 2016. Morphology in typology. In A. Hippisley & G. Stump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Morphology*, pp. 710-7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1] Packard, J. L. 2000. *The Morphology of Chinese: A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2] Sagart, L. 1999.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23] Schleicher, A. 1859. *Zur Morphologie der Sprache*. St Petersburg: Eggers.
- [24] Schuessler, A. 2018. The Old Chinese language. In P. R. Goldin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arly Chinese History*, pp: 199-217. New York: Routledge.
- [25] Humboldt, W. 1836 *Über die Verschiedenheit des menschlichen Sprachbaues und ihren Einfluss auf die geistige Entwickl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 Berlin: Königl.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Morphological Meanings and Language Forms: A Review on Jiang (2021)

LUO Tianhua and DENG Shuwen

[Abstract] Cross-linguistically, certain morphologies are found in diverse forms in individual languages. In a view of comparative morphology, *The Morphological Studies of the Tibetan Language* systematically describes the word formation and morphology of Tibetan. It shows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rphological meanings and forms with detailed data. This work presents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ibetan by comparing Tibetan with Chinese and som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It contributes not only to the morphological study of (Sino-) Tibetan, but also to the general morphology theory.

[Keywords] Tibetan morphology word formation morphological meaning language forms

(通信地址: 310058 杭州 浙江大学文学院/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

【本文责编 普忠良】